

高市搞事 给日本带来一场外交灾难

吴寄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上海市日本学会顾问

2025年的日本政局堪称一部跌宕起伏的惊悚剧,只能用一个“乱”字来概括。

日本政坛深度震荡

自民党继2024年10月众院选举惨败后,在今年6月、7月分别举行的东京都议会选举和参院选举中又遭遇了“二连败”;石破茂虽勉力支撑,但在自民党内反对派

“逼宫”压力下不得不宣布辞职;而接替他的高市早苗又因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差一点与首相位置失之交臂,直到10月下旬与日本维新会“闪婚”后才被选为日本第104任首相。

今年日本政坛再度进入深度震荡的变革期,凸显三大特征:

其一是传统政党日渐式微。自民党党员数从巅峰期的500万减至91万,在这次参院选举中比例代表区的得票率由3年前的34.40%跌至21.64%,公明党的支持母体创价学会也失去昔日的集票能力,得票率由3年前的11.70%跌至8.80%,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得票率与3年前持平,并未成为自民党流失选票的“吸尘器”。

其二是新兴政党迅速崛起。由于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潮的泛滥,标榜“日本第一”的参政党成为这次参院选举的最大赢家,得票率由3.33%猛增至12.55%,所占议席也由1席跃为14席。

其三是社交媒体崭露头角。以往决定选举胜负的除“招牌、地盘和钱包”外,主要看候选人与选民握手次数多寡,如今却取决于社交媒体上的点击数和粉丝数。

难逃“短命政权”噩运

首相高市早苗作为自民党极端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一貫以安倍继承者自居,将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实现日本大国迷梦视为自己的至上使命。日本一些评论家认为,高市上台



■ 东京民众抗议高市错误言论

新华社发

才是日本真正的“国难”,理由有三。

第一,高市属于“剧场型政治家”,擅长作秀,却拙于协调,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她在自民党和内阁人事安排上执意论功行赏,任人唯亲,不仅激化了自民党内部矛盾,也让朝野政党关系趋于紧张。

第二,高市未担任过重量级阁僚,缺乏历练,又不善学习,固执己见,我行我素。眼下日本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平抑物价上涨势头,她却效仿前首相,推行积极财政,导致日元贬值、输入型通胀越发严重。

第三,高市长期以来媚美反华,眼界狭隘,又不识大局,狂妄自大,恣意妄为。她上任才半个月,就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挑衅性言论,给日本带来了一场外交灾难。

目前,虽然自维联盟勉强达到众议院过半数席位,在参议院却依然处于少数。日本时隔15年再次出现“扭曲国会”局面,高市内阁在施政过程中处处受到在野党的掣肘。如果不能在应对物价上涨、振兴日本经济上拿出看得见的政绩,高市内阁最早在2026年春季支持率就可能掉头向下,恐怕难逃“短命政权”的噩运。

中日关系支柱动摇

2025年,中日关系在石破茂任内相对平稳,高市早苗掌权后便急转直下。

石破茂上任伊始就表示将致力于推

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他不仅早早就表示了访华意愿,接连派遣外务大臣岩屋毅、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访华,两国间高层接触明显增多。中日双边贸易在持续3年负增长后,2025年1至10月同比增长4.5%。民间交流也开始走出低迷状态,1至10月中国访日游客数达820万人,再次跃居访日外国人首位。

11月7日,高市在国会答辩时竟妄称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一表态违背了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中的郑重承诺,露骨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对作为二战战胜国的中国进行战争威胁,中方当即进行了严厉反制。高市面对国内外日益高涨的反对声浪,不仅拒绝撤回错误言论,还倒打一耙向中国泼脏水,妄图转移视线,蒙混过关。

这次中日间的对冲烈度远超2010年的撞船风波和2012年的购岛风波。由于高市的错误言论,支撑中日关系的三大支柱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动摇:一是首脑外交停摆。中日双边贸易额4年里下跌近30%,已被中韩贸易反超。2025年虽有所回升,但两国关系紧张将使经贸进一步受到拖累。三是民间交往降温。高市错误言行对两国民间交流产生消极影响。总体而言,中日关系的“寒冬”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

美国正在发生迅猛的政治板块漂移和碰撞。不管是分权制衡、司法独立还是大学自治,这些理念都被美国长期自诩为不可撼动之信条,但也尽数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剧烈变形。

总统特朗普再度执政后,手握参众两院和最高法院的多数,背靠“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支持,以空前手段加强白宫对联邦政府的控制,继而对行政部门的权力边界进行“极限试探”——对国会议员和联邦法官发出弹劾和人身威胁;攻击批评特朗普的媒体人员和机构;清除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中调查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官员;以冻结联邦资助、吊销学生签证为手段干预大学行政;不与州政府商议就在“兰州”“蓝市”部署国民警卫队;施压美联储降息;以总统行政令越过国会、在全球范围内征收关税。特朗普毫不掩饰其希望彻底推翻当代美国的基本政治运行架构的目的,不仅要构建白宫绝对领导一切行政机构的单一行政权,甚至是要构建一个不论立法还是行政,不论是州还是地方,都要完全服从白宫的单一行政国家。

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大肆罢免现任官员职务、撤销对政治对头的优待,激烈的碰撞带来了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特朗普式美国”。

然而,碰撞总是相互的,巨大的作用力势必招致旗鼓相当的反作用力。

在法律上,特朗普掌控行政机器,共和党掌握参众两院,保守派占据最高法院多数席位,使得本届白宫可以在很多方向上走得更远,但并非没有边界。最高法院虽然屡屡为白宫开绿灯,甚至确认联邦地区法官无权发布全国性禁令,但远远说不上“百依百顺”。在较低级别的联邦法院中,白宫败诉更是家常便饭。

在政治上,爱泼斯坦档案案、空袭伊朗核设施等议题引发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支持者对特朗普的怀疑。今年以来,共和党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地方选举中连遭败绩,西班牙裔对于共和党的支持也大幅跌落。在去年大选中因为期待特朗普解决经济问题而为其投票的选民已经开始流露出失望情绪。

特朗普的一系列新政能否缓解美国社会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内部矛盾,还是给矛盾源头火上浇油?在这些新政中,落地最快、效果最为显著的措施包括给科技巨头、大公司监管松绑、减税、削减福利,这些都必然会加剧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至于加征关税和打击非法移民,这些举措显然会助推美国的通胀,是否能够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促进普通人就业,则要打一个问号。

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白宫和共和党很可能失去对众议院的掌控。当然,即使“特朗普式美国”半途而废,也不意味着“过去的美国”将简单回归。特朗普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可能不会长期主导美国的政策方向,但或许会产生持续的深远影响。

美国政治板块正在迅猛碰撞

欧洲内忧外患 苦寻破局之道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2025年的欧洲,处于多重结构性压力交汇之中,遭遇内外交困,在压力中艰难前行,苦寻破局之道。

2025年欧洲内部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并未缓解,反而在长期积累后持续外溢。

在政治层面,持续右转,战略焦虑严重。其一,极右翼势力持续崛起,“极端化”“碎片化”从局部现象演变为欧洲政治常态,主流政党对政治议程的控制力持续下降。在德国,选择党已成为联邦议院第二大党,在葡萄牙、波兰等国,极右翼政党的影响力达到新高。反建制力量已从边缘走向政治核心,持续压缩主流政党的政策空间。其二,法德轴心的领导力和战略协调力不强,内部分歧导致欧盟在关键议题上决策延滞,行动能力受限。其三,“特朗普2.0”治下的美国在政治、军事安全、经贸,尤其是乌克兰问题上全面施压欧洲,加上俄乌冲突延宕,消耗了欧洲的资源和战略耐心,扩大了内部分裂。

在经济层面,复苏乏力且不均衡。欧盟与欧元区2025年经济增速预计仅1.4%和1.3%左右。随着欧洲国防开支刚性上升,债务利息负担加重,欧盟整体赤字率出现反弹,公共负债水平重回上升通道。

2025年欧洲遭遇的最大外部冲击来自美国。美国对欧洲的态度,正从“默认优先的盟友”转向“需要不断证明价值的伙伴”。无论是年初慕安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对欧洲理念、民主制度和移民政策的严厉抨击,还是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阐述的美国战略重心转移,都充分体现了美欧关系日益加深的结构性裂痕。

美国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安全和军事、经贸、价值观与秩序三个方面。在安全和军事领域,乌克兰问题是美欧博弈的核心,但双方关切重点已大相径庭。对欧洲而言,俄乌冲突直接关乎欧洲大陆安全秩序;对美国来说,则更多与成本控制和战略重心调整相关。在经贸领域,美国持续以“对等关税”、补贴和技术限制施压欧洲,跨大西洋经济关系从互补走向结构性博弈。更深层的变化体现在价值与秩序层面。美欧尽管并未在理念上彻底分

道扬镳,但“共同价值”的整合作用明显减弱,跨大西洋关系从“价值共同体”逐步转向以安全和利益为主导的功能性联盟。

在三重重压之下,欧洲意识到美欧关系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变,“战略自主”的呼声持续升温,但欧洲无论在军事、安全、经贸还是价值观上,均不具备完全摆脱美国的现实基础。因此,欧洲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不能上桌”的情况下,也只能和特朗普政府虚与委蛇,在经贸上被迫签下完全不对等的协议。

2025年,中欧关系呈现了“高开低走、年尾回暖”的特点。年初,在中欧建交五十周年节点的推动下,高层互动和政治沟通保持较高频率;但随后受到欧洲内部政治博弈加剧、对美博弈关系牵动以及经贸技术议题分歧冲突外溢影响,中欧之间沟通节奏有所放缓;进入年末,随着欧洲遭遇内忧外患的压力,主要成员国对外政策重心回归务实,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副总理和外长相继访华,强调稳定预期与分歧管控,中欧关系出现回暖迹象。因此,在外部压力叠加的背景下,中欧关系已更具“抗波动性”。